

Guanli Zhexue Xinlun

Guanli ji Jiangou

# 管理哲学新论

## 管理即建构

姚鸿健/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管理哲学新论

——管理即建构

姚鸿健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理哲学新论:管理即建构/姚鸿健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07-5276-1

I. ①管… II. ①姚… III. ①管理学—哲学  
IV. ①C9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2971 号

责任策划:姜 明

责任编辑:姜 明

封面设计:牛 钧

---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5.2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 管理哲学新学科的开山者

## ——鸿健其人其文

(序言一)

贺立华

鸿健是我 1977 级的大学同窗好友,我虽痴长他几岁,但却习惯称他为“兄”,因为我敬这位志在高山而又脚踏实地、富有才华而又行事低调的师弟为“77 级”一代人的优秀代表;视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传人,在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梁漱溟、晏阳初诸多先辈知识分子的影子……他是我辈同学的楷模。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77 级”的入校,让整个山东大学充满了勃勃生机。鸿健兄是经济系的“小羊群”(属相“羊”)里的“骆驼”,除了同学们对他身材高大的谐谑之意而外,我对戏称有着别样含义的理解,那就是:鸿健兄对知识的渴望恰似饿慌了的骆驼见到了丰茂的草地,他对山大图书馆浩瀚书籍的极大阅读量,他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他对高文典册例如《资本论》背诵如流的本事,他学术理想的远大以及探索未知世界的执著精神……很像一匹行进在荒漠中的不知疲倦的骆驼……

“大二”期间,《资本论》是经济系的主课。当时著名学者马

家驹先生是《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讲老师。马先生上课时总是抱着一大摞中外不同版本的《资本论》，然后相互参照，逐句、逐段、逐页地领读、讲解，每一章节结束后再串讲。马先生讲课，旁征博引，细致入微，口若悬河，神采飞扬。每讲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又不时地搬出黑格尔……在马先生这位著名思想家启蒙下，鸿健完全被《资本论》的逻辑力量所征服，以至于把《资本论》当成了一部哲学著作来研读，并把阅读的过程当作了“跟着思想家思考”的过程（马家驹先生语）。也正是此时，鸿健兄朦胧中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相对应，人类应该还有一部《经济辩证法》。鸿健说：“这件事，我辈有责任来做。”这是何等豪迈的学术志向！二十岁出头的小师弟这些想法与仅仅为了摆脱贫穷而考大学的我这样的“老三届”相比，一下子拉开了思想境界的距离，不由我汗颜而心生敬意。

以鸿健兄的天分才华和勤奋努力，毕业后完全可以坐在大学书斋里喝着茶继续他的课题研究，轻轻松松做一个出色的教授。但是他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社会才是它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在这个大的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成果才是有生命的。鸿健的工作经历中，三度进出学府，又三度参与社会实践，教过书、干过企业、出任过多个角色的政府官员，他把这些从政经商的实践经历，都看作是对社会的阅读，是对书本理论的实验。他是个官员型的学者，又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一直是《青年思想家》学术圈里活跃的思想者，又是具有“济世”情怀、关注社会人生的脚踏实地的改革实践者。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弄潮的鸿健，国家教学名师于良春教授将其比喻为“胶东半岛的改革新星李向南”，社会学家庄平教授将其评价为“可以成就大事的学者”。……

20世纪80年代，鸿健曾任莱阳市体改委主任，在大力推行国企改革的同时，他提出了国企改制要依次经历身份革命、经营

权革命、所有权革命的“三步进程”理论，在全国理论界与实践界都有很大影响，30多年过去了，至今学界还在引用他的观点。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曾一度出现过“逆市场化”的思潮，把分配不公、腐败滋生等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搞过了头。但鸿健强烈反驳和抵制这种思潮，他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更坚决的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而决不能开历史倒车，“革改”是没有出路的！他在《青年思想家》《学习时报》等报刊撰文为“一次分配重绩效”“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步伐不能停”而热切地鼓与呼，一度风生水起，引发了不小的学术争鸣。

20世纪90年代，在时任中共莱阳市委书记慕永太先生的领导与支持下，鸿健效法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深入乡村，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字号”企业老板、农村干部一道，进行“用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试验探索。《青年思想家》一班人曾跟踪研究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鸿健在推动“莱阳试验”的同时，心里怀想着先辈们当年的“乡村建设”，他与历史遥相呼应、与前辈学人隔时空对话，他以实际行动向仰慕的前辈学者致敬。那时的鸿健，一身风尘，两脚黄泥，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奔走于乡村农家、阡陌田间，游说鼓动、献计献策……至今那里仍传颂着他“和省级大领导辩论”“蒜薹砸车事件”“白手起家建集贸城”“起死回生供销社”“集合个体农户乘船出海”等许多勇于改革的传奇佳话。他对农民的尊重、对土地的关切，他的悲悯、率真与人文情怀，他的理想、抱负和变革勇气，他的运筹帷幄以及实际操作的智慧与能力，都令人敬佩、令人感动……这段难忘的莱阳试验探索，被理论界称为是“从凤阳（农业大包干时代）到莱阳（农业产业化时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家刘小龙教授语）。其间，鸿健对陷入困境的供销合作社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修炉补灶”式的改革，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改革典型。当时他提出的“优势环节启动，

专业合作社起步,联合各种成分的合作社,走向‘社中有社’的复合社”的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革思路,至今仍是全国供销社系统大力倡导的做法。尔后,鸿健依据那个时代的试验与探索,著有《莱阳试验》《后双层经营体制——中国农村经营制度设计》两部著作。研读他那个时期的著述会发现:这是一个有真才实学且富有思想激情的人;这是一个不但能够说出一种文化而且善于做出一种文化的人;这是一个为追求真理而甘于沉入社会底层承接地气的人;这是一个能够准确诊断把握中国社会脉搏的人。他的著述记录着历史、指示着未来,其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鸿健兄是名副其实的“三农”问题专家和合作社问题专家。

社会的实践、改革的浪潮、世事的变迁、迎来送往的应酬以及官场文化的规训,并没有消磨掉鸿健的学术理想、治学志趣、思想锋芒和知识分子气质。大学时代萌生的“人类应该还有一部《经济辩证法》”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脑际,伴随了他的大学生涯,也伴随了此后数十年的社会实践。大学毕业后,鸿健曾在中共烟台市委党校执教三年,主讲管理专业。在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转型、更新之后,他把写一部《经济辩证法》的想法变成了写一部《管理哲学》,并且付诸实施。1984年动笔,1995年完稿,历时十余年。这就是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哲学:规律与对子》。该书初步填充了这个学科的空白,进入许多院校的课堂,影响甚大。但鸿健自己并不太满意,他多次跟我说:“那部书有两个缺点:一是结构上有问题,‘板块式’结构,缺乏逻辑力量;二是学术味太浓,缺乏可读性。”他坦言:“那个时候的我,创建新学科的心情还是太急切了,但激情有余,功力不足。”这种学术的缺憾痛苦,一直折磨着他,不管走到哪儿,一提到这部书的缺憾他就说:“这是我的一块心病、一种纠结,不了却这件事寝食难安。”于是,鸿健决心重写一部《管理哲学》!由于行政工作繁忙,

他不可能系统地从事这项工作，但在《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青年思想家》等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批相关的阶段性成果。从“一线”退下后，鸿健又轻车熟路地重拾这个课题，将20年前写出的《管理哲学》彻底掰开、捣碎、糅细，潜下心来，闭门谢客，重新建构。青灯黄卷，日夜不辍，细针密线，精益求精，终于钩织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备体系——《管理哲学新论——管理即建构》，用他的话说“算是了却一桩夙愿”。

《管理哲学新论》近30万言，两年写就，不少同学校友惊叹鸿健写作速度之快，称其著作是“才子书”。但知情的《青年思想家》同仁们都知道，这是他数十年的厚积而薄发。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间，鸿健出版过五部专著，发表过大量论文，这些都是今天这部大成果的副产品。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当年山大校园里那个满头青丝的青年才俊鸿健，如今已两鬓染霜年近六旬了……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一幅由中国末代皇储爱新觉罗毓岳书写的“有猷有为有守，立德立功立言”的对联，对联虽已泛黄陈旧，但它传递的中国士人的君子气象历久而弥新。鸿健视此联为墨宝，更视此联为人生座右铭。正如对联之寓意，鸿健把自己丰富曲折的经历，把他的猷、为、守、德和功，最终凝结为一部“立言”——《管理哲学新论》。这部书的写作，伴随了鸿健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这部书是他数十年孜孜以求的结果，是呕心沥血之作，是他最疼爱的“孩子”；这部书是他阅读经典、亲历实践、研究问题、思考人生所形成的学术思想之集大成；这部书凝聚着他丰富厚实的生活阅历、深切的社会忧患和历史感悟，也凝聚着他广博的学识和知识分子的风骨精神；这部书以其广博的内容、精奥的学理、严谨的逻辑，显示出很强的原创性，填补了哲学研究和管理学研究的一块学术空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曾经沧桑、正值学术盛年的鸿健拿出的这部《管理哲学新论》，较之青年鸿健的成名之作，立论更为稳健、思想更为深邃、情感更为内

敛、学术智慧更为凸显、语言表达更为圆熟老到、思辨著述更趋向经典化。应该说,它是鸿健数十年治学的重要代表作。

《管理哲学新论》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管理学著作,还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属于一个由多学科统合而成的边缘性、横断性学科。这样的题目,没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没有现代的战略眼光、没有缜密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很难驾驭的。难能可贵的是,鸿健以龙蛇之笔生动可感地将知与行、感性体悟与理性思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原本艰涩的思辨课题,深入浅出地书写出来,使得《管理哲学新论》成了一部相对易读易懂的书。

首先,这部书体系严谨,逻辑上容易把握。全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的总论,作者把千差万别的管理对象,抽象为具有十一个方面共同本质属性的“结构”,进而提出了“管理即建构”的命题;第二部分是第二至十二章,按“结构”的内在逻辑秩序依次分述了结构的本质属性中蕴含的矛盾关系及一般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第三部分便是第十三章,实际上讲的是管理哲学研究所应遵循的一般方法论问题。这样的体系,逻辑清晰,结构完整,掩卷而思,历历在目。

其次,这部书突出体现了理论问题的可读性。书中的理论演绎与处事哲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每到艰涩处,作者总会信手拈来中外经句、典故、谚语、哲理等许多智慧的花朵,使枯燥的理论顿显新鲜灵动,读来引人入胜。好似在险峻山路上攀援,每到风光妙处,便有一座凉亭立于眼前,供人止步小憩、凭栏遐思。

所有的作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这部著作亦然。比如在某些理论观点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炼斟酌;在管理领域中的哲学层面与操作层面的方法如何过渡衔接上,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对因顾及可读性而对著作应有的科学性与严密思辨性的影响,也会有读者见仁见智的不同思量……

相信作为管理哲学这门学科的开山者和已占居学科高地的鸿健兄，不会就此停下思想脚步，必定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探索。“行百里者半九十。”祝愿鸿健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拥一片思想蓝天，造一方精神家园”，展平生之所学，奋力而前行。

（贺立华先生，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

# 历史的回音 现实的奏鸣

(序言二)

张景芬

人们常常喜欢用“S”形来形容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但我认为用“Z”形来形容更贴切:“S”是平滑的、缓进的,“Z”是剧烈的、突兀的;“S”可以表现为较长时间的社会改良,“Z”则在几十年之内演绎几百年的历史。处在社会的急剧转折时期,如何从革命走向建设?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如何从产品经济转入商品经济?如何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如何从政治威权走向民主与法制?中国这个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浑然大块,又一次遭遇同现代化的冲撞——社会需要觉醒,民众尚须启蒙,历史需要反思,官方权力须有知识及思想的支撑,企业更需要产业理性的导引。

正是基于这种时代的需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支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等为主体的年轻知识分子队伍应运而生,他们以期刊《青年思想家》为旗帜,成为解放思想、反思历史、传播文化、研究改革开放的前沿思想阵地,在齐鲁大地上呼啸了 20 多年,被社会称为“行动学派”。本书作者姚鸿健正是这一学派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有浓厚的燕齐文化遗风,许多关于道教

的神话故事在这里流传，并流布全国，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是“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了。“八仙”中有一个人物李铁拐，跛脚，身上总是背着一个葫芦，里面装着丹药，声称他的仙丹可以“包医百病”。有个路人反问他：“既然你的药可以治百病，那为什么不治一治自己的跛脚呢？”李铁拐顿时语塞，留下了“李铁拐悖论”的笑柄。

我在大学从教多年，发现大学内也存在不少“李铁拐悖论”。比如大学一般都设有经济管理类专业，也产生了许多知名的管理学专家。然而有趣的是，大学内开办的商店、餐厅等几乎无一能经营得好，大多承包给了周边的乡村企业。人们不禁要问：校内那么多管理专家，经常到校外授课，为什么不能把自己身边的事业管理起来呢？学不能致用，这是“大学悖论”。另一方面，学校院墙之外众多的乡土企业主，常常能在不完善的体制内游刃有余，完全同那些管理理论无涉，也制造了另一种悖论。知识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知识化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文明的标志，在短短30余年历经从“文革”到改革而匆匆行进的中国社会，还远未达至此。

鸿健一直崇尚实践品格，这注定了他不是制造而是打破这种“大学悖论”的人。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首批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的，毕业后甘愿下到县乡基层从事农村发展与改革的推进与研究，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全身心投入了闻名全国的“莱阳试验”。这个试验，被社会用来同改革开放前产生大寨典型的山西省昔阳县、改革开放之初产生“小岗村”土地承包制经验的安徽省凤阳县，并称为中国农业的“三阳时代”。这后一个“阳”，就是指改革向纵深发展时创造“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山东省莱阳县。鸿健正是莱阳试验的主要设计者、策划者、组织者和总结者之一，其后写有颇具影响力的《莱阳试验》一书。

近30年过去了,当年叱咤风云的一代青年思想家今日已是“尘满面,鬓如霜”,变成“老年”思想家了。社会仍在深化改革,但已脱离了风起云涌的外在形式,奔涌的激情和朝气正在沉淀为深沉的反省和规范的理性,具体的改革策论正在升华为抽象的治世哲学。正像黑格尔所说:

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私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态、超出了它的伦理风俗、它生命饱满的力量,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

哲学对于思想所开始破坏的世界要予以调和。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当哲学带着它的抽象概念出现,用灰色的颜料绘灰色的图画时,青年人有着生命力的新鲜朝气已经消逝了。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

现今,以《青年思想家》为旗帜的一代“青年人有着生命力的新鲜朝气已经消逝了”,“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管理哲学新论——管理即建构》,正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理性沉淀。

亚里士多德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是“四因说”,认为事物的形成有“四因”:物因,也称“质料因”,是“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式因,也称“形式因”,是“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动因,也称“动力因”,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极因,也称“目的因”或“终极因”,“是终结,是目的”。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概括为“3+1”范式,3即物因、式因、极因,1是动因。

“3+1”是事物构成的基本结构,这个范式在中国的《周易》中处处可见,在其他文化典籍中也时有所现。中国周易哲学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

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系辞》))

这里,形而上、形、形而下三者,是3;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统称为1。也可以用对应的另一种方式表达:道、形、器三者为3,是构成任何事物的基本内涵;变、通统称为1,是事物发展的动因。可见,《周易》内含的这一范式,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如出一辙。

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F. W. Taylor)在其名著《科学管理原理》中提出科学管理四大基本原理:

(1)开发一门新的科学,以专门研究工人工作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并从此取代昔日粗糙的经验法则。

(2)科学地选择、训练、教导和培养工人,而在旧体制下,工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并尽最大可能地训练自己。

(3)管理人员诚心诚意地与工人合作,以确保所有工作都按照新开发的科学原理去做。

(4)在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须均分工作和责任。由管理人员承担的工作,应该是他们比工人更较能胜任的新型工作,而在旧体制下,几乎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的责任都要推到工人身上。

这四个基本原理也是一个典型的“3+1”范式,其中(1)是科学管理的前提,即以“新的科学”取代“粗糙的经验法则”,我们可以简称为“科学化”,它构成“3+1”范式中的动因。其(2)是科学管理活动的基础或本体,由管理者和被选择的工人双方组成。这构成“3+1”范式中的“质”或“体”。其(3)是工人与管理人员“本体”在科学管理活动中固定化的组合方式,也是该活动“新开发”的形制,大家必须“按照去做”。这是“3+1”范式中的“式”或“形”。其(4)应该是对(2)即本体的本体论观照,也就是科学管理活动理想的新型人际关系,这是该活动的归宿,也是新一轮活动的起点。这在“3+1”范式中,是“极”或目的因。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T. Parsons)的代表作《社会

行动的结构》，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概念架构，称为“手段一目的”的框架，其中每个单元包括四个要素：(1)行动者，(2)目的，(3)情景，(4)规范限定。这也是一个典型的“3+1”范式。

更典型的是，帕森斯还提出著名的 AGIL 图式，即适应、达标、整合和潜质，将此作为社会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细而究之，他所提的四要素也是一个典型的“3+1”范式。这里，整合是内关联，适应是外关联，二者构成动因；潜质是式因，也称作“模式的维持”；达标是极因，或称“目的因”；至于质因，则是任何社会整体本身。

《管理哲学新论》一书所提出的基础概念和思想体系，正是典型的“3+1”范式。“3+1”范式的前提是要从一个“同一”或统一的事物出发，对于管理学而言，这个事物就是管理对象本身。在“3+1”范式中，它应该是“质料”或形而下之“器”。但是，正像文德尔班(W. Windelband)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时所说：

形式和质料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关系，因为同一事物可以在一个方面被考虑为形式，在另一个方面可以被考虑为一个更高的形式之质料。

一个事物可以被考虑为下层事物的形式，也可以被考虑为上层事物的质料。

管理对象，可以被作为从具体到抽象之“整体”，也可以被作为整体内部有机联系、相互依赖并有方向性的“结构”，还可以被作为升华了的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似乎是整体的回归或还原，但又不全是，因为它上升了。它是“庖丁解牛”中庖丁眼中之牛，不是常人眼中那个简单的“整体”牛，或者说，不是初学解牛的那个庖丁眼中之牛，而是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牛的自然生理结构——“系统”。按文德尔班的“相对关系”论，我们可以分别把整体、结构、系统作为不同的管理对象，也可以把三者作为“同一”事物的三个不同层次，如果“整体”是

我们要研究的客体,它即构成“3+1”范式的质料或形而下之器,那么,“结构”就是它的形式,“系统”就是“极”(目的因)或形而上之道。“结构”也可以称作为“式”或“法”,“整体”靠“法”而现“身”为“系统”,这就是现“身”说“法”,贯穿其中的动因就是管理行为即建构。

从该书的思想体系看,关于管理的本质属性共有 11 个方面,归结起来,仍是一个典型的“3+1”范式。其“体”(质、器)为整体性和时空性(整体的存在形式);其“式”(形制、结构)为协同性及主次性(协同性的延伸);其“极”(终极、目的、道)为目的性及价值性;其“动因”为能动性,它包括两方面,“变”(动态相关性、制衡性、平衡性)是内关联,“通”(开放性)是外关联。这个范式同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的 AGIL 图式如出一辙。

正如鸿健所言:大道至简。从中国的先秦,古代希腊,到今日管理哲学的再建构,其理一也。作者所提出的“建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动因”、《周易》的“变通”、泰勒的“科学化”、帕森斯的“行动”及“整合—适应”。《管理哲学新论——管理即建构》既是历史的回音,也是现实的奏鸣,是哲学映射在管理学上的一道强光。

我还清楚地记得,正当“莱阳试验”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青年思想家》的几个朋友于周末去莱阳看望鸿健,他带我们去五龙河垂钓。正值黄昏时分,垂钓处正在五龙河入海口,河海相接,水域辽阔,虫鸣趋弱,草渐枯黄。鸿健心不在金鳞,眼睛瞩望着日落处,微风拂煦,他那张被夕阳晖映的脸,轮廓清晰,像是经雕刻而成的。我的脑海忽然闪现了一幅画面:那是古镇篝火,我仿佛看到了亘古亘今簇居的农民群众的社议,听到了农民对沉重生活的叹息,身在乡村基层的鸿健,在胶东这淳朴的土地和荒寂的文化环境里,有如孤舟蓑笠,独钓寒江,心中必有和者盖寡之慨,而他“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僻,仰天

衢而高蹈”。虽身居社会基层,却依然“背负青天朝下看”,其所忧所思乃国之大计,民之根本。

同《青年思想家》其他诸学友一样,鸿健已近“耳顺”之年,然而思想家是不会停止思想的,他现在虽身居“二线”,思想仍然活跃在“一线”,创造体系,建构哲学,诚可喜可贺也。

[张景芬先生,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哲学、社会学教授]